

# 李如龙先生语言学研究体系述要

李 焱 黄 楠 赵晨晔 徐 晗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中文系 厦门 361005)

**摘要:**李如龙的学术研究涵盖了语言学的多个领域。他的研究,首先从方言学入手,对闽语、客赣语、粤语以及北方方言都有全面的调查研究。在占有大量语言事实的基础上,通过古今串联、南北贯通、书口比较,他对词汇学、文字学、汉语的特征做出了独具特色的研究。对于语言使用中的问题,也绝不回避,他的研究对社会语言学、语言教育、语言规划、文化语言学、地名学等多个学科也具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李如龙;方言学;应用语言学;词汇学;汉语特征

## 一、引言

李如龙,中国著名语言学家。1936年11月生于福建省泉州市南安县,1953年考入厦门大学中文系,师从黄典诚先生学习方言学和音韵学,完成了本科毕业论文《上古音的拟测》。1958年2月毕业留校,1960年起参加全国方言普查并主持《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的编写工作,1963年主持“福建方言讨论会”邀请全国重点高校专家对该书进行评论。1973年11月调往福建师范大学任教,1978年被评为讲师,1980年协助黄典诚先生创办福建省语言学会,1981年协助筹办全国方言学会,并受中国语言学会委托在福建建瓯举办全国性的方言讲习班,任副班主任并主讲方言调查课程,1983年被评为副教授,1987年开始招生硕士生,1989年被评为教授。1993年调任暨南大学中文系,并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批为第五批博士生导师,1997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聘为第四届中文学科评议组成员。1998年重回厦门大学中文系任教,2000年在香港大学中文系兼职招硕士生,2005年起在中国传媒大学兼职招博士生,2006年12月在厦门大学荣退,后返聘至2010年7月。20世纪90年代后先后多次到香港、台湾、美国哈佛大学、日本京都大学及法国高等研究院访问、讲学。

李如龙先生在学术界有较大影响力,系中国语言学会理事(第三届起)、全国方言学会理事(首届起)、中国应用语言学会常务理事(首届起)、中国地名学研究会常务理事(首届起)、国际客家学会理事(首届起)、国际中国语言学会理事(第三届起),还曾担任过广东省语言学会副会长、福建省语言学会会长。并被南开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十余所高校聘为兼职教授。

从事学术研究60余年来,李如龙先生出版的论著有50余种,发表的论文有300余篇,研究成果获得国家级、省部级奖励8项,如《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获国家教委第三届普通高

校优秀教材二等奖(1995)、《方言与音韵论集》获第七届王力语言学二等奖(1997)、《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获教育部第四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2006)。承担了包括“汉语方言特征词研究”“中古到现代汉语语音演变研究”“闽语特征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在内的国家级、省部级项目多项。

李先生的学术研究遍及方言学、词汇学、音韵学、文字学、地名学、文化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等语言学的多个分支学科,学术研究体系独具特色,兹举述其要者,以启后学。

## 二、方言学研究

### (一) 方言调查的成果

方言学最重视调查。李如龙先生认为“调查是研究方言的第一步,不跨出这一步,你永远进不了门”,“方言调查是方言学的根基,扎实了就能出人才,出理论”。同时,他十分认同李荣先生说的“研究方言从母语入手,从自己住地方言入手”,他说:“这样做可以由易而难,少走弯路。”<sup>①</sup>

闽语是李先生着力最多的方言。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他就在厦门大学参加全国方言普查,调查闽南话和闽西客家话,并主持编写了200万字的《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1963,铅印的内部讨论稿),后广为流传、常被引用。1973年到福建师范大学工作后,又陆续调查了数十种闽北、闽东方言。进入20世纪80年代,他就18个闽方言点的材料做了校核,经过比较,和陈章太联名发表了《论闽方言的一致性》(1982)和《论闽方言内部的主要差异》(1984)两篇重要文章,论证了闽语的分区意见,把闽粤两省的闽语作为1个大区,以下再分5个小区。这个意见已被学术界普遍接受。后来,他还为福建省内的14个县编纂方言志,并主持编写《福建省志·方言志》(1998,黄典诚主编、李如龙副主编)。招收研究生后,还带领他们发掘福建境内的小方言和方言岛,发文章、编成专书,为学界提供了可贵的材料。

李如龙先生头几年招的硕士生有几位是说客赣语的,他带领他们调查研究客赣方言,编了《客赣方言调查报告》(1992)。一直以来,该书是研究客赣方言的学者最常引用的文献。在广东期间,他还组织学生编了《粤西客家方言调查报告》,也写了几篇关于粤语的论文。

除了南方方言,李如龙先生对北方方言也有所涉猎。他在为《晋方言语法研究》(2000,乔全生)作序时便肯定“晋语研究,大有可为”,并客观地对有争议的晋方言发表自己的意见,认为“方言分区的目的不在于分区本身,而在于认识方言的特征”,从而判断“方言和其他方言的异同、远近关系”。此外,李如龙先生还指出,晋语和江淮官话都有入声,但又有明显不同;晋语的“舒声促化”现象很值得注意;除了文白异读多之外,晋语还有不少的别义异读;此外,晋语中的特征词、四字格俗语等也应该被关注。他发表的《晋语读书札记》(2004)受到晋语研究者的重视。

除了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在改革开放之初参加过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之后,李如龙先

<sup>①</sup> 辛世彪,刘晓梅.李如龙先生访谈录[M]//万波.涌泉集:李如龙教授从教五十年纪念文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495.

生就关注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比较,也寻找机会做了一些简略调查,发表过几篇文章。后来还在70岁高龄时,受孙宏开先生鼓励,领着3位博士生去调查一种新发现的民族语言,于2012年出版了《茶洞语研究》一书,为民族语言研究做出一份贡献。

有人问过李如龙先生调查过多少种汉语方言,他笑着说:“比较深入调查的大概十几种吧,初步调查作大体了解的应有数十种,帮助学生听音、定音系和词汇记音示范的就说不清了。调查方言对我并非苦差事,而是一种乐趣。”鲜活的语言材料就是方言调查研究不竭的动力<sup>①</sup>,汉语方言和汉藏语如此丰富,正是因为有先生这样的学者的辛勤劳动,这些宝贵资源才能得到开发,中国语言学才能逐渐走向世界。

## (二) 方言研究的特色

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是李如龙先生语言学入门之举,也为他的语言学生涯奠定了雄厚基础,形成了学术研究的鲜明特色。择其要者,略举如下:

### 1. 注重方言音韵综合研究

在黄典诚教授的精心培育下,李如龙先生继承了他的方言音韵综合研究的传统。他认为,方言有自己的“共时系统”,音韵的演变过程也有自己的“历时系统”,“两者各有特色”,“没有音韵学、语音史的知识,方言的层次就无法分清,方言的本字也无法考出;没有方言学的成果,语音史的研究可信度也会大减”<sup>②</sup>。他告诉学生,方言学要学好国际音标,音韵学要掌握广韵音系,这是推动方言调查的双轮,缺一不可。方言学和音韵学是双向服务的,音韵学展现了方言的语音现状及其演变规律,鲜活的方言材料又为音韵规律的考证提供例证。以往的方言调查所用的《方言调查字表》,反映的就是中古音系,记录方言字音,放在《广韵》所代表的这个作为千年标准音的系统中,就能有效地识别纷乱复杂的方音变异,对方言语音历史层次、方言本字、文白异读、方言词汇的来源等进行准确的考察。这就是方言学与音韵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李如龙先生的《方言与音韵论集》(1996)就是这种方法的研究成果,他于1997年获得了王力语言学奖和教育部社科二等奖。

历来的音韵学研究多依靠文献,不论是通语的字书或方言的韵书,文献中的差误或错漏都是不可避免的。李先生也校订过多种闽方言的韵书:《戚林八音》《建州八音》《汇音妙悟》《八音定决》,但是更加重视实际语料的调查。他认为,“方言材料作为世代口口相传的语言,是鲜活的,是直接的现实”,可以弥补文献的不足。在利用方言材料来分析音韵问题时,必须按照演变的事实,理清历史层次。“只要把历史层次搞清楚了,用方音来论证音韵问题,便会无往而不利”,他还指出,“在考察语音的历史层次时,必须兼顾、参照词汇的历史层次”。他的《自闽方言证四等韵无-i说》就是通过大量的实际语音例证,分析方言文白读的历史层次,并把语音的历史层次和词汇的历史层次有机结合起来,互相印证,才得出结论,因而受到音韵学界的重视,经常被引用。他常跟学生说:“如果没有音韵学知识,作方言调查就会寸步难行,危机四伏”,而“无视方言材料,只就典籍语料做分析,或者离开音韵学的指导进行单纯的

<sup>①</sup> 辛世彪,刘晓梅.李如龙先生访谈录[M]//万波.涌泉集:李如龙教授从教五十年纪念文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505.

<sup>②</sup> 辛世彪,刘晓梅.李如龙先生访谈录[M]//万波.涌泉集:李如龙教授从教五十年纪念文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503.

方言描写,都是行之不远的。”<sup>①</sup>

## 2. 注重考释方言词的本字

李如龙先生认为,“为方言词考本字并非为了给它寻找书写形式”<sup>②</sup>,而是为考察方言词的音义的变化,从而了解方言词与古代语言及姊妹方言之间的关系,是同字异音的语音差异还是本字不同的词汇差异。方言常用词的本字研究,对古今汉语和方言的比较、了解汉语历史演变规律有重要意义。

他主张,方言词本字考应该音义并重。除了词义论证、古文旁证,更重要的是进行严格的音韵论证,这是音韵学和方言学“相互为用的集中表现”——用音韵学原理来解释方言现象,用方言事实来论证音韵规律。他的《考求方言词本字的音韵论证》(1988)归纳了考求方言词本字的音韵论证的要点,即方言词的实际读音(包含声韵调)和本字的音韵地位必须有严格的对应关系;姊妹方言有许多来源相同、音义相对应的方言词,本字考证必须经得起“姐妹方言”的验证。至于考本字的方法,他提出三条:排除法、类推法和比照法。例如闽方言中的“过”(厦门音“kual”)表示菜很老,因为方音读为阴平,其声母一定为全清声母,故排除来自古全浊声母群、匣母的可能,此为排除法。在理清方言与古音对应关系后,根据反切找出与方言音义对应的字,此为类推法,适合对方言较为熟悉的研究者使用。例如,认定闽语的“khal”都符合《广韵》“口交切”“胫骨近足细处”的音义,可认定为“骸”。至于“比照法”,指的是姊妹方言有变例和特例之别,通过用例多的推导出用例少的,例如闽北方言有些古来母字读为s声母(鳘、鳞),经过比照闽南话也有少数反映(濼、狸)。

李先生的这些理论是从许多本字的考释中总结出来的。例如《从闽语的“汝”和“你”说开去》(2004)一文,把闽南话(厦门、漳州)的“汝”和建瓯话的“你”联系起来进行音韵论证和字义分析,从而说明这个第二人称代词的差异正是沿海闽语和内陆闽语的根本区别之一。他的《闽语的“团”及其语法化》(2005)一文,分析了“团”的语义引申及其读音的演变与语法分布特征,说明了闽语的“团”这个最重要的特征词的语法化的过程及其所体现的规律。在《说“闽”》(2017)一文中,还进一步发掘了它的深刻的文化意义及其对研究闽地历史、闽语、闽文化乃至东南海洋文化都有重要意义。可见,通过考本字,使得方言内部、方言与方言、方言与汉字、方言与普通话、方言与文化之间的联系更加明晰,这便是他所理解的考本字的深刻意义。

然而,并非所有方言词都有本字可考。除了古文献对方言字词记载不周之外,方言的不断创新,民族语的底层、外来语的借用,字义引申转移跨度大、难以辨识等都是方言词本字无考的原因。因而他强调,考求方言词本字应该谨慎从事,宁缺毋滥。

## 3. 注重方言特征词研究

以往研究方言,多关注语音,而对方言词汇语法则有所忽视。在调查了许多方言的词汇之后,李如龙先生提出了“方言特征词”理论,认为方言之间不仅有不同的语音特征,还有不同的词汇特征。方言使用者对方言特征词的敏感度甚至比语音特征更高。他指出,判定方言特征词必须对区内外方言进行全面考察。各区方言都有自己的特征词,但由于不同地

① 辛世彪,刘晓梅.李如龙先生访谈录[M]//万波.涌泉集:李如龙教授从教五十年纪念文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504.

② 李如龙.考求方言词本字的音韵论证[J].语言研究,1988,(1):110.

域的交往,方言区之间也会有共同的特征词,也应该给以承认。“独有特征词是个体特征,共有特征词是关系特征”;方言区还有典型的核心区 and 边缘区之分,特征词的考察应以核心区为重点;方言特征词应有一定批量,但数量多少各不相同,不宜设定“统一标准”。常用的单音词、重要的基本词:例如吴语的“侬”、客赣语的“渠”、粤语的“嘢”是提取特征词的重点。所提取的方言特征词必须按照不同的重要性进行分类。具体来说,大方言区(如吴、闽、粤)的区别特征最重要,而更大的方言片(如近江方言、远江方言)以及较小的区、片的重要性则较低。都是特征词,区内覆盖面越宽、与别区方言交叉越少的越重要;越是常用的特征词越重要;基本词汇比一般词汇重要;单音词比多音词重要;词根特殊的比词根相同词缀不同的重要。他还强调,“词汇学的横向比较……不论是词汇系统的研究、词义系统的研究还是造词法系统的研究都应该以方言特征词的研究为中心”<sup>①</sup>。

李先生先后对闽方言、客赣方言和官话方言特征词都进行过考察,多年后,在《论方言特征词的特征——以闽方言为例》(2014)一文中又进一步阐述了方言特征词的基本特征——频度特征、结构特征、语义特征、语法特征和用字特征,使他的方言特征词理论更加充实。

方言特征词是“一定地域里一定批量的,区内大体一致,区外相对特殊的方言词”。也就是“常用的,有构词能力的、区内一致、区外特殊的方言词”<sup>②</sup>。这些词因为使用频率高,构词能力强,组句频度高,在词汇系统中占据重要地位。又因为内同外异的特点,就成为划分方言区、考察方言间亲疏关系的重要根据。由此可见,方言特征词理论有重要的价值。

#### 4. 注重方方的比较研究

比较研究法在李先生的整个学术思想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他曾说,“调查和描写只是研究的准备,只有比较和解释才是研究的开始”。他还认为方方的比较研究“拿语言事实来检验已有的理论,经过比较和解释来修正旧理论、创造新理论”<sup>③</sup>。通过横纵比较对方言内部语音差异、词汇差异、语法差异,以及方言外部的不同语言间的接触和演化、系统和特征进行全面的分析,才能使汉语方言学为汉语语言学做出重要的贡献。他的学生后来把这些系统的观点概括为“十字架理论”。

汉语方言的研究,语音方面比较成熟了,词汇语法方面还较为薄弱,方言与方言之间的横向作用以及历史文化的比较也还没有走出一条明确的路子。有鉴于此,李如龙先生在20世纪最后5年中集中做了一些比较研究,发表了一批重要论文,2000年又在《语文研究》分两期连载了《论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世纪之交谈汉语方言学》的长文,接着用同样的标题把13篇论文编成专集,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同年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育部重点教材《汉语方言学》中,则用三章分别讨论了语音、词汇、语法的比较研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论文集在两年内连续印刷了三次,后于2006年被教育部评为第四届高校优秀成果二等奖。可见,他的十字架理论是在世纪之交形成的,同年的两部代表作则是它的标志。

李先生把比较研究提到方法论的高度,认为只有比较研究才能认识方方的演化过程和发展规律。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及汉藏语系语言的整体研究也要应用方方作比较,在微观考

① 李如龙.论汉语方言特征词[J].中国语言学报,2001(10).

② 李如龙.汉语方言特征词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3-4.

③ 辛世彪,刘晓梅.李如龙先生访谈录[M]//万波.涌泉集:李如龙教授从教五十年纪念文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496.

察中多一些宏观的思考,在罗列语言事实的基础上,尽力做出合理的解释,从中提炼出切合汉语实际的演化发展规律和接触变异的规律。

后来的十几年间,李如龙先生又陆续发表了《关于东南方言的底层研究》(2005),《汉语方言的接触与融合》(2008),《论混合型方言——兼谈湘粤桂土语群的性质》(2012),《全浊声母清化的类型与层次》(2014),《演化与接触,系统与特征——再论方言的比较研究》(2015)也都是运用汉语方言语料进行比较研究,进一步阐发他的理论。经过对几种典型的过渡型方言的比较,他指出要归纳类型特征,区别不同的等差,把认为方言的分化和演变存在的“混合型方言”和“过渡型方言”区别开来,丰富了学界对汉藏语的认识。他还在《关于东南方言的“底层”研究》(2005)中强调,语言比较必须兼顾同源、接触和类型三类别,做好定量和定性分析。正如他所说“在描述事实的基础上,尽力解释,并不断从中总结汉语实际的演化发展的规律和接触变异的规律”<sup>①</sup>，“将历时比较方法和类型学比较方法相结合,从而更好地进行方言研究”<sup>②</sup>。这些论述为汉语方言与汉藏语比较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滋养。

### 5. 注重方言文化研究

通过多年田野调查,李如龙先生对方言与地域文化的关系有深刻的思考。他在《方言与文化的宏观研究》<sup>③</sup>中指出,语言是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也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反映着文化的创造和变迁。同时,语言和文化又是不同的客体,是历史关联的两种事物。因此,语言的研究不能无视文化,文化的研究也不能无视语言,两者的研究又是不能互相代替的。这些观点在当时文化语言学的发展初期,无疑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从文化角度对语言现象进行分析和解释”的方法也为后人在语言研究中拓宽了视野。他运用方言实例说明了各大方言区在整合、差异、分布、接触、运用和演变六个方面的表现及其与地域文化背景的关系。而在微观层面,则认为要“透过具体的方言事实去追寻文化演变的踪迹。”

方言与文化的具体研究,李先生也是应用比较方法来研究的。在《东南方言与东南文化论纲》<sup>④</sup>一文中,他首先列举了长江以南、京汉线以东的东南方言各区所共有的方言特点,并以此考察出东南文化“非主体性、离散性、潜力大和开放性”的共性特点,又从“东南沿海区和内陆区的方言差异”分析了东南文化的内部差异。在《客家方言与客家的历史文化》<sup>⑤</sup>中,他再次强调“方言事实是考察历史文化的重要依据”,通过客家语料的比较,分析客家方言的碎片,说明其底层现象和相互渗透及其与客家历史文化的关系。在《闽粤方言的不同文化特征》<sup>⑥</sup>中,李先生将方言的文化特征定义为“方言在内外关系和古今流变中所表现出来的特征”,他认为这种特征“并非是方言内部结构决定的,而是由历史文化背景决定的”。文章从“方言的内部差异和代表点方言、方言与古今共同语的关系、方言的运用和方言间的接触、方言演变的类型和整合的模式”四个方面比较出闽粤方言的不同文化特征。李如龙先生的专著《福建方言》(1997),是方言与地域文化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曾获福建省人民政府社科优秀

① 李如龙.演化与接触,系统与特征:再论方言的比较研究[J].国际汉学学报,2015(1):46.

② 李如龙.演化与接触,系统与特征:再论方言的比较研究[J].国际汉学学报,2015(1):46.

③ 李如龙.方言与文化的宏观研究[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10):139-148.

④ 李如龙.东南方言与东南文化论纲[J].东南学术,2004 增刊:205-207.

⑤ 李如龙.客家方言与客家的历史文化[J].嘉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98(02):115-120.

⑥ 李如龙.闽粤方言的不同文化特征[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99(11):4-10.

成果奖。全书共有9章,绪论部分概述了方言和地域文化的关系;第1~4章“从文化背景看方言的形成和发展”,用移民及社会变迁等史料来说明福建方言的形成、演变和流播;第5~6章是微观研究,“从方言看文化的演进”,用方言词语、谚语、歌谣等的文化含义及其历史由来论证古代福建的经济社会的历史情况,他认为“这类文化词的资料积累多了,既可以从宏观上为方言作历史文化的定位,也可以补充许多典籍史料上的不足”<sup>①</sup>;第7章用方言词语说明全省共同的思想观念和风俗习惯、民间信仰;第8~9章从共时方面讨论了“不同方言所反映的不同地域的文化类型”并“对于福建方言和文化的总体概括,并说明了其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共同的规律”。基于对方言的历史、现状的深刻理解,李先生将方言与地域文化的研究提升到了理论研究的高度,具有学科建设的意义。该书出版时中国文化语言学还处于发展初期,可借鉴的成果不多,曹志耘等国内学者认为,李先生立足于自己多年方言调查的一手材料,突破了“就语言研究语言”<sup>②</sup>的框架,“建立起透过方言研究地域文化的理论框架”,具有开创性成就。

### 三、词汇学研究

李如龙先生一开始调查方言就十分重视词汇。因为他着重研究的东南方言和通语的词汇差异很大。后来从方言词汇的比较进入与古今通语的比较,20世纪初又介入了全国的词汇学研讨会,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文,对词汇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举其要者有如下数端。

#### (一)关于汉语方言的词汇差异

早先的研究者分析方言词汇差异时,常说的是形同实异、形异实同,单双音不同,前后缀不同,词义广狭不同等等,李如龙先生不满足于这种表面上的归纳。1982年他发表的《论汉语方言的词汇差异》,提出了“5类19型”的差异。5类是“源流差异、意义差异、构词差异、价值差异和音变差异”:源流差异是词源的比较,同源的又有异流和异程之别,异源则有底层和借贷;意义差异是词义不同,包括词汇意义、语法意义和修辞意义的不同;构词差异是词法的比较,如重叠式、附加式,单双音、语素逆序,双声叠韵、衍音嵌音等;价值差异是词值的比较,指的是派生能力、组合能力和常用度的不同;音变差异是词音的不同,指连读音变和一字多音。关于方言与通语的差异则提出了“对立型、对应型、交叉型、并用型和补充型”5种,有不少很新颖的提法。该文不久就被苏联学者译成俄文发表于“国外语言学新天地丛书”的《中国语言学》专辑。

2006年,在上海的一次国际会议上,李先生发表了《论不对应词及其比较研究》,他提出的“不对应词”,指方言与方言或者通语之间,一方成词,一方不成词、而用词组来表达。例如普通话的“回家、告诉”在一些方言就没有相对应的单词,而说成“转到屋里厢、你讲他知”,厦门话“有影”是“有这回事”,广州话“放水”是“私下给人方便”,据《福州方言词典》抽样调查,

① 李如龙.关于方言与地域文化的研究[J].泉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5(01):48-56.

② 李如龙.福建方言[M].福州:福州人民出版社,2000:2.

前 90 页的 1637 条方言词中,这类不对应词就有 481 条,占近 30%。许多方言研究者是根据调查词表,从普通话词汇出发去调查方言词的,这类不对应词就无法发现。关于方言词汇差异的这些归纳和发现给人们许多有益的启发。

## (二) 关于词汇的比较研究

李如龙先生调查研究方言词汇,要和普通话做比较,和别的方言作比较,考察源流时又要和不同时代的古汉语作比较,介入词汇学研究之后,他对于“研究近代汉语,不管上古汉语和现代汉语,研究现代汉语的词汇只管描写,不联系方言,也不接触古汉语”的现象并不认同,认为“这种分割的状态对于词汇学理论体系的建设非常不利”。并指出“古今贯通,南北结合”的研究方法才有可能建立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sup>①</sup> 不论是方言学、词汇学,他最注重的就是比较研究,并强调要把它提升到“整体的方法论的层面去理解和操作”<sup>②</sup>。他的《谈谈词汇的比较研究》指出,“词汇的比较既需要共时的比较,也需要历时的比较”。共时的比较包括共同语和方言的比较、方言间的比较。比较的内容包括词音的比较,如多音连读变调规律与是否成词及词语结构有关;词形的比较,如表示同样概念的语词是单音还是多音;词义的比较,即词的基本义、引申义、附加义之间的差异。至于历时的比较,便是现代汉语和方言与古汉语及其方言的比较,目的是考察词汇的演变过程和发展规律这方面的比较研究,他指出,首先的切入点是“基本词汇的调整和更替”;其次是“义位的扩充和缩减”的比较;再次是“对词汇的传承和变异的比较,即从某一断代语言或方言的词汇系统,研究其传承词、变异词、新造词和借用词的各自所占比重,并分析其历史地位和演变个性”。最后是“考察不同时代造词法的流变,将不同时期造词法的词语所占比例统计出来,加以比较”<sup>③</sup>。李先生在多年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词汇比较研究理论,不但自己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对后人的研究也有重要的启发。

## (三) 关于汉语词汇的多元系统及其动态流变

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李如龙先生致力于汉语词汇系统的研究。在《论汉语词汇的多元系统》(2010)中,他所理解的多元系统包括八个系统:“词汇的构成系统、词汇的生成系统、词音的组合系统、词义的延展系统、词语的层级系统、言文分歧的交叉系统、词汇的空间分布系统和词汇的演变历时系统”。对于形成多元系统的原因、各系统之间的紧密关联以及所体现出来的语言规律和汉语特性,该文都做了详细的分析。该成果在某些方面填补了学界在相关问题研究上的不足。词汇学大家张志毅先生称他是“思路独到,论断新颖”“独树一帜”。例如,“构成系统”,他说的是核心词、基本词和一般词构成的“同心圆”系统,一般词包括行业词、方言词、文言词、外来词和新词语。三个同心圆之间有明显的衍生关系。这个同心圆,“从理论上说是研究认知过程和语义关联的重要依据,在应用上也是母语教育和第二语言教

① 辛世彪,刘晓梅.李如龙先生访谈录[M]//万波.涌泉集:李如龙教授从教五十年纪念文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

② 李如龙.谈谈词汇的比较研究[M]//词汇学理论与实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③ 李如龙.汉语词汇学论集[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138-147.



育必须寻求的途径。”<sup>①</sup>。又如他说的“层级系统”指的是，语素(字)、词、语、句构成的系统。常用的单音词是层级系统的核心，双音词是基础，各个层级之间是有弹性的，有时，惯用语、引用语还可以把一个复句拿来当一个词用。所谓“言文分歧的交叉系统”，指的是历来书面语和口语的差异，这是汉语的重要特征。所谓“交叉”，一是常用的核心词是共用的，一是用久了二者也能互相转化。把言文的分歧提到词汇系统的高度来理解也是具有创新意义的。

如果说多元系统是共时的研究，李先生所强调的词汇的生成和词汇系统的动态演变，便是历时的研究。在这方面他发表的5篇力作也颇有新意。《论音义相生》(1997)和《论汉语词汇衍生的方式及其流变》(2002)两篇讨论了古今词汇衍生的4种基本方式及其演变顺序。这4种衍生方式最早的是盛行于上古时期的因音生义(近音通转和同音假借)和因义生音(辨义异读和变调别义)；而后是“语素合成”，即上古后期产生、汉唐盛行的两个单音词借用句法结构合成的双音词；还有就是宋元以来迅速发展的“语法类推”(实词虚化)和“修辞转化”(隐喻、四字格成语、惯用语、缩略语等)。《论汉语词汇系统的生成与发展》(2010)进一步分析了这四种衍生方式的发展规律：从无理据(因音造词)到有理据(因义造词)，由单音到复音，形成了词汇衍生的“陀螺模式”<sup>②</sup>，所以喻为“陀螺”是着眼于词汇使用中的动态运作和发展。《论汉语的单音词》(2008)用大量的数据论证了单音词一直是汉语词汇的核心，使用频率总是最高的。早期汉语确是“单音节的孤立语”这也毋庸置疑；到现代汉语，词汇的系统已经成了“单音词为核心、双音词为基础”的格局，这就是汉语词汇系统的类型特征。关于汉语词汇系统的动态发展，李先生还在《词汇系统在竞争中发展》(2004)加以描述，说明竞争是发展的动力。他罗列了大量材料说明自古以来汉语词汇的5种竞争：基本词汇与一般词汇的竞争，传承词与变异词的竞争，书面语词和口语词的竞争，通语词和方言词的竞争，自源词和外来词的竞争。数千年竞争的结果，使汉语的词汇越来越丰富，表义功能越来越强，义类的划分又精细、又概括，词形则越来越多样化。

李先生对于汉语词汇的共时和历时两个方面的精细研究和深刻分析，提出了词汇构成系统的“同心圆”理论，词汇衍生和发展的“陀螺模式”理论，都是颇具新意的，对汉语词汇研究有重要启发。

#### (四)关于词汇的规范研究和教学研究

李如龙先生研究语言学都是语料的调查、理论的探讨和应用研究同时兼顾的。词汇学研究方面也是一样，在应用研究方面应该提到的是他关于词汇的规范和口语词汇教学的研究。

他在《词汇规范问题漫议》(2003)<sup>③</sup>一文认为：“语言的规范和变异都是经过人们的言语活动来实现的，语言是社会的，言语是个人的，已有的语言规范规定着言语的基本格局和规则，言语的创造则推动着语言的变异……词汇从变异走向规范，主要是依靠言语实践的自然调节，也就是各种变异在千百万人的重复使用之中的优胜劣汰。”在此基础上，他提出的词汇规范研究应该“尊重语言变化发展的事实，及时发现新词新语以及旧有词语的新用法……在

① 李如龙.汉语词汇学论集[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3.

② 李如龙.汉语词汇学论集[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23.

③ 李如龙.词汇规范问题漫议[J].汉语学报,2003(4).

了解词汇变异的事实之后,应该进行分析,作出评价。”他还认为,对词汇不规范的原因也要进行深入研究,并且有针对性地进行宣传教育,从根本上整治不规范现象的措施”总之,他的词汇规范观是,尊重语言变化发展的事实,站在事实的后面去分析其得失和优劣,总结隐含其中的规律,这体现了对过往单一规范政策的改进.他还说:“从‘匡谬正俗’到‘研究、评价和认定言语的变异’,这是仅数十年间的语言规范观的重大进步。”这也是李先生词汇学研究的真知灼见之一。

## 四、汉字和汉语特征研究

李如龙先生在大学时代就投入“文字改革三大任务”,为推广普通话做了大量工作。研究方言后,又集中研究了汉字和汉语的关系。2001年,发表了《汉语与汉字的关系论纲》,2008年在北京语言大学两次演讲之后,整理了《从汉字和汉语的关系看汉语的特征和发展》,2009年在《吉林大学学报》发表了《汉语和汉字的互动与和谐发展》,2014年在《语言教学与研究》发表了《汉语的特点与对外汉语教学》,又在“光明讲坛”做《汉字的历史发展和现实关照》演讲,全文发表于《光明日报》(12月8日),2015年在《新疆师大学报》发表了《汉字的发展脉络和现实走向》并为两家文摘报转载。李先生把近十几年间与此相关的论文编成《汉语特征研究》一书,2019年在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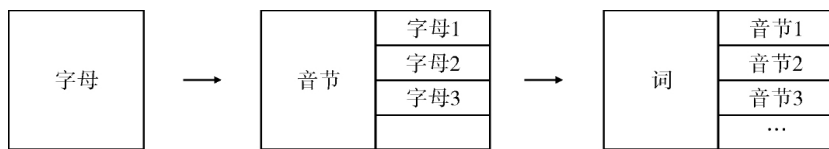
### (一) 关于汉字的双重性质

研究汉字的学者以往总是坚持“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的观点,把汉字和汉语分割开来,研究汉语和汉字的学者各说各话。李先生是从方言调查研究进而研究普通话和古代汉语的,联系到从小识字读书都是和汉语汉字打的交道,体会到现代的汉语汉字已经拧成一股绳了,1986年他参加了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知道不再推行“汉字拼音化”了,经过一番思考,他认为“汉语和汉字的关系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独特的。汉字不是汉语的外衣,而是细胞”,因为汉字作为单音词或语素,已经具备了语言的性质。李先生据此认定了汉字具有文字与语言的双重性质。正是这种二重性,使得汉语成为世界上独特的类型。关于汉字表达汉语与西方拼音文字表达印欧语的不同,李先生做了这样的表述:“汉字标记汉语的方式是综合型的,自身的结构方式是立体化的,形音义之间的关系是一体化的,文字的单位 and 语言的单位是相对应的。可用下图表示:



如此,语言和文字之间是深度的关联、内在的关系,形神相配、水乳交融,文字也就是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

与此不同的拼音文字标记语言的方式是分析型的,结构方式是平面性的,形音义是直线分层排列的,文字单位和语言单位是不相对应的。可用下图表示:



这种类型的语言是一个字母或几个字母组成一个音节,一个音节或几个音节组成一个有意义的词。语言与文字之间是浅层次的关联、外在的关系,文字(字母)只用于表音(音素),字母和音节只有组词之后才与意义相关。”<sup>①</sup>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其他表形、表意的文字都早已消失了,为何汉字之间还能忠实而挺拔地为汉语服务?显然,汉字独具的二重性正是他存活的最重要原因。

## (二) 关于汉字与汉语的关系

在《从汉字和汉语的关系看汉语的特征和发展》一文中,李先生指出,汉字作为集形、音、义于一体的语言单位,是汉语中最常见的结构因子。而在形音义的组合中,以“义”为中心,字义明确、读音灵活且字形稳定,“见字知意”,便于不同时代、不同方言地区的人们得以书面交流,具备了超时空、超方言的魔力,甚至还传到国外用为表达不同语言的文字。

从汉字和汉语的发展历史上看,一方面,汉字以增加字音异读和字义的多项分化的方式,保持语音和语义的关联,作为音义的沟通因子,适应汉语扩充词汇、增加表达语法意义的虚词的需要,使汉语汉字都能得到健康的发展。在词汇的衍生上,汉字作为单音词不够用了,便通过语义合成的方式,组成双音词,又用字义的虚化作为语缀和虚词组成多音词语。另一方面,表音不力、字形复杂、字数太多,使得只有少数人掌握汉字。读书人用字造词,劳动者连音成语,久而久之,扩大了书面语和口头语的分歧,但也正是表意的汉字使得书面语词和口语词得到沟通。汉字与汉语正是在这相互矛盾和相互适应之中不断地“互动和谐”<sup>②</sup>,才能双双获得强盛的生命力。李先生对于汉语与汉字关系的探讨,不仅有助于解释实词、虚词、兼类词、词义的引申、多音字的滋生等一些具体的词汇现象,还可以帮助解释词汇史和语法史的问题,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不仅如此,李先生还认为:“汉字和汉语的关系是个关键问题,抓住它就应该能为探索汉语的特征,科学地研究汉语找到突破口”。长期以来,学界“总是以印欧语为依据总结理论,并拿它推论为语言共性”,他认为应该改变这种状况,“坚定不移地研究自己的语言的特性”,在世界语言学研究的舞台上“争得一份话语权”<sup>③</sup>。

## (三) 关于汉字的历史功勋、拼音化运动及汉字的前途

汉字虽然难学,其表音不力也确是大缺陷,但正是表音含糊、表意得力,使它能够时贯古今、地通南北,便于超时空传播。这种魔力就使许多古代语言的词语能够传承后代。像“三人行必有我师”这样的话能为数千年后的孩子听懂,怕是多数外国文字无法做到的。汉字所记录的文言能够兼通古今南北,这就使汉语没有分化为多种语言,中华文化也能得以长久而

① 李如龙. 汉语和汉字的互动与和谐发展[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9(2).

② 李如龙. 汉语和汉字的互动与和谐发展[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9(2).

③ 李如龙. 汉语和汉字的互动与和谐发展[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9(2).

广泛的传承,使国家和民族虽时有分裂却能保持统一。现代汉语的文言词多、成语多,就是词汇丰富、表达能力强的重要因素。用汉字记录的汗牛充栋的文献也是世界上无可匹敌的。可见,汉字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建立了伟大的功勋。

然而汉字也确有严重缺陷,初学者入门不易,深造也难。近代以来,由于文盲充斥、科技落后,国家积贫积弱,几乎沦为殖民地。在晚清的维新运动中,有识之士发起“切音字运动”,民国之后又有新文化运动,提倡汉字拼音化。激进者甚至喊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口号。经过数十年的努力,从注音字母、拉丁化、罗马字到1958年的汉语拼音,汉语拼音化终于找到了最佳方案。在识字学话、传播查询等许多方面大有助益,但是汉字拼音化却出现了种种无法克服的难题。1986年终于停止了拼音化改革的口号。

“汉字拼音化”终止了,对于100多年的汉字拼音化运动应该作何评价?李如龙先生在《汉字的类型特征和历史命运》中写道:“几代爱国学者为此殚精竭虑,探索改革方案,编教材、办刊物,组织教学试验班,即使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之中,他们也在难民营里、在根据地的农民夜校里,用‘新文字’帮助文盲识字、教唱抗战歌曲。其革命意志和奉献精神感人至深、令人敬佩。”

从1986年到现在,30多年过去了,对于汉字为什么不宜拼音化这个问题,虽然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过许多提法,近来却还没有进行仔细地清理和深入地研究。李如龙先生的《汉字的历史发展和现实关照》一文提出了两个原因:其一,“汉字有双重身份,它不但是汉语音节的记录符号,也是汉语的语素”;其二,“由于表意汉字作为沟通的桥梁,古代文言和现代白话并不存在鸿沟”,改用拼音文字,不但文言词、成语,连许多书面语词都难以存活,这就是“目治自明,耳闻难清”的道理。

关于汉字的前景,周有光先生曾提出“字有定量,辅以拼音”和“限用汉字、精简汉字”并加强常用字研究。李先生很同意。他认为,依据汉字使用频率的高低淘汰低频的生僻字,可以降低汉字学习的难度。应该确定现代标准汉字,包括供初学者用的常用汉字,规范的通用汉字,可替换旧字的备用汉字等,以保证汉字使用的规范。至于夹用汉语拼音,李先生在近年的文章中也有一些具体意见。前几年,关于“字母词”可否进入现代汉语词典的争议已经有了结论,应由少到多、由易及难逐步扩大,让拼音成为汉字的“第七书”,从与意义无关的译音词、纯音缀、拟声词开始,逐渐形成夹用拼音的习惯,再图其他的可替代的汉字。日本人使用的文字包括汉字、假名和罗马字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可以研究借鉴。

#### (四)关于汉语特征的研究

2013年,李如龙先生在《语言科学》上发表了《汉语特征研究论纲》,这是他多年思考和研究的心得。李先生认为语言的共性和个性是互相依存的,只强调共性的研究不利于个性的认识,尤其像汉语这样特立独行的语言,不强调个性的研究就容易陷入印欧语研究的理论窠臼,认真研究汉语的特征不但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在应用方面也有很大价值。该文除了列举了汉语内部结构亟须深入研究的若干个性特征之外,还强调了外部的与文化相关联的特征:书面语和口头语的差异、通语和方言的分歧以及汉语和汉字的特殊关系。这是他从事汉语学习和研究半个世纪之后融会贯通的体会。从那时到现在的十几年,他按照自己找到的路子继续研究了一些特征项,加上以往就某些特征做的研究成果,于2017年编成了《汉语特征研究》一书。该书包括总论8篇,语音、词汇、语法、方言、文字在内的分论18篇。其中,关

于汉语和汉字的关系这一重要特征的就有 5 篇;方言方面有综合讨论混合型方言、濒危方言、方言特征词的;语音方面重点讨论的是汉语语音系统的特征、浊音声母清化这一汉语语音史的最重要事实、汉语特有的文白异读现象;词汇、语法方面重点论述的是常用词的比较研究、官话方言的词汇特征、古代汉语“辞”的研究和字辞结构等问题。此外,还讨论了一些如何按照各种特征做好语言教育的问题。

## 五、应用语言学研究

李如龙先生从事语言学教学与研究 60 年了。应该说,从一开始,到退休之后,他一直热衷于语言学的应用研究。他经常跟学生们说,语言学不能“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天”是理论的概括,“地”是为应用服务。语言学只有不断有理论的发明和实践的应用,才能有强盛的生命力;个人从事语言学工作也只有“顶天立地”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他自己在应用方面的研究实践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 (一)关于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推行文字改革三大任务的时候,尚处青年时期的李如龙在上学、开始任教时,就热情地投入简化汉字、讨论汉语拼音方案和推广普通话的各项工作。20 世纪 60 年代在做方言调查时还组织编写《学习普通话手册》,下乡教扫盲班、为中小学培训普通话师资。20 世纪 70 年代为开设“语言教育”课,研究地方普通话,为了试验汉语拼音,主办《汉语拼音》小报在全国高校内部发行。20 世纪 80 年代为培训方言调查干部,受中国语言学会和国家语委委托,先后在福建省建瓯和泰宁主办高校青年教师培训班。1992 年被国家语委评为全国语言文字先进工作者。2004 年作为学术委员参加编制《普通话水平测试大纲》,近几年先后被教育部聘为普通话审音委员和语言资源保护咨询委员。

### (二)关于语言教育研究

关于现阶段我国的语言教育,李先生认为应该包括两大门类、四个基本阵地和三个过程。两大门类是母语教育和第二语言教育;四个基本阵地是通语教育、民族地区双语教育、对外汉语教育和外语教育;三个过程是学前教育、学校教育和离校后的继续教育。其中第二语言教育研究的对象有三个方面的内容:民族地区的汉语教育、对外汉语教育、针对中国人的外语教育。他对语言教育的研究重点在于母语教育和对外汉语教育。

关于母语教育,李先生集中注意的是口语教学和方言地区通语教学中的方言辨正,就此提出了一系列的教学建议。例如,语音教学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拼音教学,从音素、音节和词、语、句组成的各种不同长度的音流都得贯彻到底(2015)。<sup>①</sup>就汉语的特征来说,声调是学习的难点,此外还有普通话和方言的送气、不送气之别,清浊之异,韵头、韵尾,入声字的教学都是难点和重点,最好的办法是分词比字。20 世纪 60 年代曾经使用过的“方言辨正”的方法取得过良好的教学效果,不应该放弃不用。方言地区的普通话学习者一般都有自发地运用

<sup>①</sup> 李如龙,陈瑶.从语音特征出发设计语音教学[J].学术研究,2015(3).

对应规律进行类推的能力,应该加以启发、提供必要资料让他们自觉纠正;在语流音变方面如轻声、儿化、连读变调等在不同方言中往往有别,学普通话也会造成困难。对此,李先生给的方案是:把体现连读音变的常用词语集中起来,按照义类列成词语表,或者选编常用易懂的惯用语、谚语、歇后语乃至儿歌、绕口令、小故事,作为课外阅读材料,既能学到连读音变的规律,还能从中理解语调和句子结构的关系以及语调和语义、语体和语气之间的关系,也可以增加学习语言、体验文化的趣味,可有一举多得之妙。<sup>①</sup> 语流音变中的语调教学难以规格化,可让学生在交际过程中模仿适应。

还有,汉语书面语与口语之间的巨大差异也是母语教学要十分关注的。书口之异的最重要原因是汉语采用了表意汉字,书、口分道扬镳已久,经过了长期的加工提炼,形成了各自的词汇、语法和表达系统。<sup>②</sup> 既然二者之间有重大差异,就应该认真研究母语教学中如何采取不同的教学对策。在母语教育中,历来强调“读写训练”,忽视听、说的口语教学。<sup>③</sup> 李先生认为,语文教学应该加强口语教学的力度,口语训练不仅仅是要求教好标准的普通话,还包括言语交际能力的训练。任何时代的书面语都必须根植于口语的土壤之中,才能获得强盛的生命力。读写训练也应该强调努力做到口语化。他曾在《口语和口语训练》(1993)一文中做过详细论述:口语的交际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说话者拥有语言知识的纯熟度、言语应用的能力、记忆力及思维能力,尤其重要的是灵敏度,对外部世界的观察力和应变力。他在文章中介绍了口语训练的项目:语音训练、语词训练、语句训练、语脉训练、语意训练、语境训练、语体训练和语态训练,给出了一些具体的训练方法,使口语训练能够科学有效地进行。在教学方法上也要进行相应的改革,多让学生开口,组织多样化的、适合年龄特征的口语活动。这些观点都为母语教学提供了新的思路,使母语教学能够兼顾书面语和口语,从而使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得到均衡的发展。

李如龙先生在对外汉语教学方面的研究更加全面详细。他曾经从语音、文字、词汇、语法几个方面总结了汉语的特点,并根据这些特点分析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

在语音教学方面,他强调了声调的教学,学生母语中没有的元音和辅音以及多音字、多音词语的连音变读都是对外汉语教学的重要难点。所以,语音教学不能止于拼音教学,对于没有语感的外国学生来说,语音教学应与教词汇、教课文相结合,贯穿全过程。

关于汉字教学,他指出,汉字“既是表意为主的文字,又是形体系统和语素系统的重合”,汉字以表意为主,表音不准,字数繁多,形体复杂,确实难学难记。据此,他认为应该充分利用汉字的频度规律编好基础教材,教好最常用的汉字的音义,并努力培养释词、造词的能力。这是改革汉语教学的根本。

在词汇教学方面,李先生明确提出,对外汉语教学应以词汇教学为中心,以前的语法教学为中心的教学理论是根据西方语言的特点提出来的,并不符合汉语教学的需要。<sup>④</sup> “以词汇教学为中心”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帮助学生扩大词汇量。汉语词汇是集语音、语义、语法、语用和文化于一体的,所以以词汇为中心并不是孤立地学习词汇,而是在教学上要树立全局的

① 李如龙,陈瑶.从语音特征出发设计语音教学[J].学术研究,2015(3).

② 李如龙.“书”“口”之异与汉语教学[J].海外华文教育,2018(3).

③ 李如龙.“书”“口”之异与汉语教学[J].海外华文教育,2018(3).

④ 李如龙,杨吉春.对外汉语教学应以词汇教学为中心[J].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4(4).

系统观。李如龙先生从汉语词汇的特征出发,总结出对外汉语教学词汇教学的重点,并提出了词汇教学的两个原则,即词汇教学应该遵循区分频度原则和语素分析原则。他主张,在教学中大力加强单音节核心词的教学和组字成词、组词成句的“字词句直通”教学法,处理好口语和书面语的词汇歧异和沟通。<sup>①</sup>

关于语法教学,李先生指出汉语语法的特点是缺乏形态变化,结构单位富有弹性,词类兼用,虚词用法都与外语不同,宾语和补语很特别等等。他认为,对外汉语教学历来比较重视口语训练是好的,但是教材相对单调和陈旧,详细讲解许多“语法点”却学不到用词造句的方法。他主张多编反映社会生活的读物和声像材料供外国学生阅读。<sup>②</sup>

21世纪初办起孔子学院,对外汉语教学转变为汉语国际教育,李如龙先生一介入此领域的研究就提出:汉语国际教育架起汉语—文化金桥的伟大工程,应该让外国人就地学习汉语,了解中华文化。为此必须努力建造两个桥头堡,从根本上改造教材和教学方法,既能更好地体现汉语的特征,又能适应所在地的国情、地情和民情。十几年间,他的汉语二语教育都致力于提取汉语的特征和呼吁“国别化”。事实证明,他的学术研究是审时度势的。

李如龙先生在暨南大学工作的几年还对东南亚华人所传承的汉语方言和语言生活进行了一些调查,并组织师生参加调查工作,开辟了境外汉语方言调查的新路向。除了调查语料之外,他还进行了社会语言学分析,探究汉语方言是如何在外域的土壤中得到继承和发展;东南亚华人当前多语并用、方言萎缩的语言生活现实;以及不同国家语言政策的比较研究对未来语言生活的影响等问题。相关的研究成果有《略论东南亚华人语言的研究》(1997)、《东南亚华人语言研究》(2000)、《华人地区语言生活和语文政策》(2004)、《华人地区的语言教学与教学语言》(2016)等。这些成果加深了我们对东南亚华人的历史文化的认识,也为华文教育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

### (三)关于汉语地名学研究

李如龙先生在教育语言学方面的另一个研究领域是地名学研究。中国古代就有一些学者研究过汉语的地名,但是汉语地名学并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sup>③</sup>他研究地名是从参加20世纪80年代地名普查开始的。历来地名未经整理,有些混乱,而且考定地名往往需要多个学科的知识,地名是古代社会传承下来的地理标记,是一定的社会群体为特定的地域所约定的专有名称。<sup>④</sup>作为社会现象,数量庞大的地名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构成和演变都有一定的规律,因此地名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sup>⑤</sup>他还提出,汉语地名的调查只有使用语言、方言调查的形音义方法才能做到科学化。在研究过程中,不仅要运用语法学和词汇学的理论和方法,还应有地名学自己的独特方法,如类聚方法和列图方法,并参考历史地理学的资料。按照这样的思路,他潜心研究汉语地名十年,写成《汉语地名学论稿》和《地名与语言学论集》两部著作,为用语言学方法研究汉语地名提供了第一个范本,从语言学本体、语言文化

① 李如龙.汉语的特点和对外汉语教学[J].语言教学与研究,2014(3).

② 李如龙.汉语的特点和对外汉语教学[J].语言教学与研究,2014(3).

③ 李如龙.汉语地名学论稿[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④ 李如龙.汉语地名学论稿[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⑤ 李如龙.汉语地名学论稿[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学、应用语言学三个方面展现了汉语地名的特征。

关于汉语地名的语音,李先生指出,与其他语词的读音相比,地名的古读多、生僻音多、异读多,方音差异也大。地名的历史层次多,分布在不同方言地区,本地人使用频繁,世代相传,口口相传,与一般用字读音不同,需要考证。汉语地名的用字也有类似的特点:古字多、方言字多、生僻字多、异体字也多,同形词也多,对于形成这些特点的原因,李先生也做了历史、地理和方言的分析。

李如龙先生从词汇语法角度对汉语地名进行分析这一部分着墨最多。他指出,地名词和其他语词有相同的结构方式<sup>①</sup>,有共时和历时两个系统,也有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之别。地名总量虽然很大,但是因为绝大多数小地名只在本地通行,不为外人所知所用,地名的基本词汇比一般语词少得多,需要着重研究的是地名中的通名和同形异名以及同名异形,这也是历史和地理的原因造成的。此外,地名中还包含有文言词、方言词和外来词。他指出,地名中的文言词使用频率较低,需谨慎处理;而对于通名中的方言词,则亟待整理,确定其形音义,以便减少异读和异写。<sup>②</sup>至于地名中的外来词,多数是殖民者留下的,必须加以清理。

对地名的词义进行分析后,李先生指出,地名的意义是相对稳定的,但也有它的基本意义、附加意义和引申意义。基本意义是地名的中心意义,附加意义则是地名的外围义,二者相结合构成了地名的概念意义。地名词义的变化,最需要关注的是方位含义和附加义的变化。

地名是语言中最常用的词语的一类,是人类认知活动的产物,往往寄托着人们的审美情趣和思想观念。反映了一定的价值观、道德观和生活理想以及政治意图。因此,地名也成为文化语言学所关注的研究内容。

地名是当地人民在长期交际生活中约定俗成的,地名的存在,首先是为本地人的交际服务的。<sup>③</sup>李先生认为,地名的命名法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他把对地名的命名法分为三类:描述性地名、记叙性地名、寓托性地名。

## 六、余论

自1958年2月厦门大学毕业留校起,李如龙先生已经在语言园地耕耘60余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的学术之路具有鲜明的特征。其一是重视田野工作,掌握语言事实的第一手材料。他的方言调查从自己最熟悉的闽南方言入手,逐渐扩展到闽东、闽北,对闽语有了相当全面的理解;然后又从闽语扩展到客赣语、粤语以至北方方言,形成了由近及远、对各重要方言的全面了解。在调查中,由表及里,实现了对语音、词汇、语法、音韵的全覆盖;由点及面,实现对方言片、方言小区、方言大区乃至方言过渡带的全面考察;由今及古,实现了方言与古韵书、古辞书的融会贯通。其二是注重理论探讨,从不满足于旧知。在占有大量语言事实的基础上,通过古今串联、南北贯通、书口比较,李先生在方言特征词理论、汉语词汇的

① 李如龙.汉语地名学论稿[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② 李如龙.汉语地名学论稿[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③ 李如龙.地名与语言学论集[M].福州:福建省地图出版社,1993.



发展研究、汉语的特征研究、汉字与汉语的关系研究、语音的历史层次与语言接触理论等方面形成了不少重要见解,充满着思辨不止的学术探讨精神,不断扩展着学术研究的边界。其三是注重语言的应用研究,对语言使用中存在的问题从不回避,而是迎难而上,在应用中发现问题,用应用来检验理论。这种学术态度,使他的学术领域遍及社会语言学、语言教育、语言规划、文化语言学、地名学等多个学科,并且彼此交叉,相互为用。

方言学研究是一个四通八达的十字路口。从历时层面看,今天的方言是保留了汉语历时演变层积的结果;从共时层面看,方言保留了最为丰富的语言事实;从与社会的关系看,方言与历史、文化紧密相连。李先生的研究,从方言入手,又从方言中走出去,在语言研究的海洋中畅游,也为中国语言学科的建设添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 附 李如龙先生著述一览

### 一、专著教材

- 1.《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主要作者 与黄家教、詹伯慧、许宝华合作),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
- 2.《闽语研究》(主要作者 与陈章太合作),北京:语文出版社,1991年。
- 3.《福建文化概览》(副主编),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4年。
- 4.《福建双方言研究》(与庄初升、严修鸿合作),香港:汉学出版社,1995年。
- 5.《福建方言》(福建文化丛书之一),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
- 6.《汉语地名学论稿》(现代语言学丛书之一),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
- 7.《汉语方言学》(教育部重点),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
- 8.《现代汉语方言概论》(参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
- 9.《从方言比较看官话的形成和演变》(参编),香港:霭明出版社,2003年。
- 10.《汉语方言学》(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
- 11.《闽南文化百科全书》(分卷主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
- 12.《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调查手册》(参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 13.《普通话水平测试指导用书》(福建版)(主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 14.《茶洞语研究》(中国新发现语言丛书)(与侯小英、林天送合作),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年。
- 15.《汉语方言调查》,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
- 16.《汉语特征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9年。

### 二、字典词典方言志

- 1.《客赣方言调查报告》(主编 与张双庆、万波、邵宜、练春招合作),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
- 2.《福州方言词典》(第一作者 与梁玉璋、邹光椿、陈泽平合作),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
- 3.《建瓯方言词典》(第一作者,与潘渭水合作),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
- 4.《福建省志·方言志》(副主编),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年。

- 5.《福建县市方言志 12 种》,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 年。
- 6.《福州方言志》(第一作者),福州:海风出版社,2001 年。
- 7.《〈戚林八音〉校注》(第一作者),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年。
- 8.《广州话正音字典》(副主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 年。
- 9.《MINNAM—ENGLISH DICTIONARY》(闽南—英语词典)(与李竹青合作),美国:DUNWOODY 出版,2008 年。
- 10.《全球华语词典》(编委之一),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年。
- 11.《尤溪县方言志》(李如龙、张其兴主编,邓享璋、林天送副主编),福州:海峡书局出版社,2015 年。

### 三、个人论文集

- 1.《地名与语言学论集》(独著),福州:福建省地图出版社,1993 年。
- 2.《方言与音韵论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1996 年。
- 3.《方言学应用研究文集》,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年。
- 4.《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年。
- 5.《汉语应用研究》,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4 年。
- 6.《闽南方言语法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 年。
- 7.《汉语方言研究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年。
- 8.《汉语词汇学论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 年。
- 9.《汉语特征与汉语国际教育》,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6 年。
- 10.《汉语特征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8 年。

### 四、主编

- 1.《动词谓语句》(东南方言比较研究丛书),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7 年。
- 2.《客家方言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 年。
- 3.《粤西客家方言调查报告》,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 年。
- 4.《代词》(东南方言比较研究丛书),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 年。
- 5.《介词》(东南方言比较研究丛书),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 年。
- 6.《东南亚华人语言研究》,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 年。
- 7.《词汇学理论与实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年。
- 8.《汉语方言特征词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 年。
- 9.《汉语方言研究文集》,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 年。
- 10.《汉语词汇计量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 年。
- 11.《台湾及东南亚华文与华语研究》,香港:霭明出版社,2004 年。
- 12.《闽南方言》,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 年。
- 13.《客家方言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 年。
- 14.《卓越汉语·轻松入门》,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 年。

## A Summary of Li Rulong's Linguistic Research System

Li Yan, Huang Nan, Zhao Chenye, Xu Han

(Xiamen University, College of Humanit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361005)

**Abstract:** Li Rulong's academic research covers many areas of linguistics. He began with dialectology and conducted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Min dialect, Hakka dialect, proverbs, Cantonese, and northern dialects. On the basis of possessing a large number of linguistic facts, he has made a unique contribution to lexicology, philology,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language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ancient and modern, northern and southern, and oral and written language. He never evaded the problems in the use of language. His research is also instructive for sociolinguistics, language education, language planning, cultural linguistics, toponymy and many other disciplines.

**Keywords:** Li Rulong; dialectology; applied linguistics; lexicology;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学术编辑:李无未)

李焱,男,厦门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黄楠,女,厦门大学中文系 2017 级硕士研究生。

赵晨晔,女,厦门大学中文系 2017 级硕士研究生。

徐晗,女,厦门大学中文系 2016 级硕士研究生。